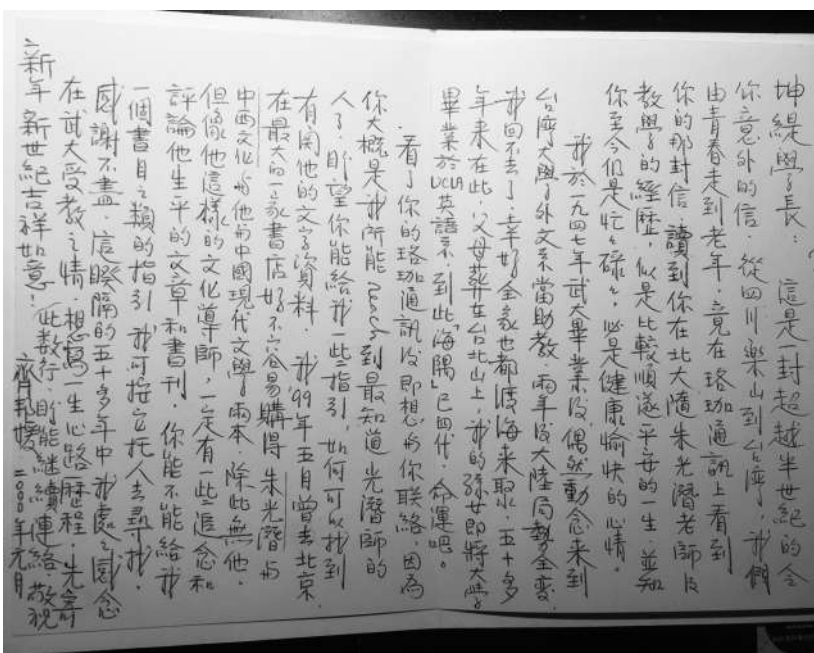


# 从齐邦媛说到朱光潜

张刃



2000年，齐邦媛写给卢坤缜的信。

他与朱光潜交往更多也更深。先生对他的帮助并不限于传道授业，更在他遭遇危难时施以援手和保护。张高峰终生感念朱光潜的厚爱，可惜他只在朱光潜多活了3年。

张高峰1940年插班入读武大政治系三年级，朱光潜时任武大教务长兼外文系教授。当年许多学子对朱光潜的著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推崇备至，能够成为朱光潜的学生，更感荣幸。张高峰不时登门求教，从此交往近半个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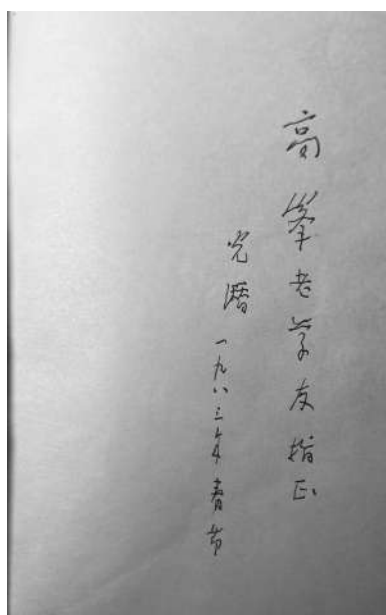
由于入学前张高峰已是国际新闻社特约记者、入学后又应聘为重庆大公报西川通讯员，所以他在武大的课外活动多与新闻工作有关。他曾牵头举办包括敌后及中共主办的“全国报纸展览”，又在校内编发“新闻部队”壁报，参加进步学生团体活动，并以真名在中共主办的重庆《新新日报》上发表作品。他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学生的注意和盯梢，并且被列入黑名单。

1942年春起，国民党当局多次给武大校方下达对以张高峰为首的十数名“危险分子”加强监视直至“强制离校”的密令。朱光潜作为教务长，完全可以“奉命行事”，照准执行。但是，出于对学生的爱护，考虑到张高峰等即将于暑期毕业，因而一再设法拖延，直至考试结束才通知张高峰，当局有此密令，不得不动他离校。张高峰十分感谢师长的保护，随即离开乐山到重庆，应聘大公报战地记者，去了中原。

两年后的1944年9月，张高峰忽然重返武大，再次插班读书。许多师生感到奇怪，张高峰为什么毕业两年后又回来当学生？这在武大是没有过先例的。

原来，当年6月，张高峰从中原战场报道豫湘桂战役后回到重庆时，日军已占领湖南，进逼广西，桂林大公报被迫闭馆，人员撤退到了重庆，报馆一时人满为患。于是张高峰由报馆资助重回武大，同时兼职西采访报道。

张高峰能够重回武大，批准人教务长朱光潜是承担了很大风险的。这不仅因为1942年夏，张高峰是被强迫离校的，而且在1943年春，他从中原发回的报道《豫灾实录》披露河南灾情，闻下大祸，导致大公报被停刊三天，他也在河南被捕，这些情况武大校方不会不知道。“前科”加“新案”，武大还能够接纳他吗？他先给朱光潜写信，探寻有无可能返校。按说，对于已经毕业两年，而且是“危险分子”的学生，朱光潜完全可以推脱、婉拒，但他却很快给张高峰复信表



朱光潜赠张高峰《美学拾穗集》，并在扉页题字。

示同意，并特意要他趁校长王星拱正在成都养病的机会，尽快前来报到。因为王星拱做事谨慎，如果事先知道，可能不会批准。于是，张高峰回到乐山武大，插班入读历史系三年级。

张高峰到校后，注册了学生资格，一度又恢复了“新闻部队”壁报，再次引起官方注意。朱光潜特意提醒张高峰，你在教育部和乐山警备司令部是“挂了号”的“危险分子”，还是多读书、少活动，免得找麻烦。朱光潜一片苦心，张高峰很是感激。那以后便很少再参加学生活动，课余时间都用于外出采访了，直到一年后日本投降，奉召回重庆大公报工作。朱光潜面对自己的学生遇险境，不顾当局压力，两次施以援手，完全超出了他作为教师的职责，难能可贵。

## “我不会离开北平”

1945年抗战胜利后，朱光潜出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卢坤缜也随先生到北大做助教。彼时，张高峰做大公报记者常驻北平，与朱光潜见面更方便了。

1946年夏，全面内战爆发，朱光潜深感忧虑。每次见到张高峰，必询问战局，谈论国是，哀叹人民之痛苦不幸，抨击政府之腐败无能。1948年冬，解放军开始包围北平，南京政府派来专机，点名接一批教授南下，其中就有朱光潜。张高峰闻讯后特地去看他，朱光潜明白张的来意，主动说：“我不会离开北平。为什么要走呢？”他坚持留在北大，与

师生共同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美学界开展了一次全国性的大讨论，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朱光潜美学思想进行“批判”。朱光潜以赤子之心积极地投入了这场论争，他说，自己“不隐瞒或不回避我过去的美学观点，也不轻易地接纳我认为并不正确的批判……我开始认真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此，他在年近花甲时开始学习俄文，对照英文、德文、中文的不同版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准确理解其中含义。他还注意到，参加美学讨论的某些人，对与美学相关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缺乏基本常识，因此下决心翻译一些西方相关重要著作，填补国内美学资料的空白。

1963年某日，张高峰陪同学、漫画家方成去朱光潜家请教美学问题。朱光潜见到自己的学生很高兴，一边笑着问方成，你这个化学系学生怎么改行画了漫画？一边拿出自己新译的黑格尔的《美学》书稿借给了他。朱光潜说，他在用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翻译西方美学经典著作，争取晚年给自己留下更多的研究资料。此后，张高峰调离北京，十几年没有再见朱光潜。

## 最后的岁月

“文革”结束后，张高峰重新工作。1980年初，他到北京访友，特地到北大去看望朱光潜，那也是他们师生最后一次见面。朱光潜逝世后，张高峰在《人民日报》撰文纪念，追忆了当时的情景和后来的交往：

……先生不在家，朱师母奚今吾一时认不出我，问道：“你是哪一位？”我说：“是张高峰。”她又惊异地问：“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也不知自己成了什么样子，想来十年煎熬，必是“面目皆非”了！朱师母高兴地亲自为我带路，去外语系办公室看望朱光潜。进屋后，我边说“张高峰来看您”，边向朱光潜深鞠一躬。先生放下手中烟斗，慢慢站起来，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能感觉到他激动的情绪。

“文革”中，这位大师级的教授被剥夺了教学资格，奉命去翻译联合国文选……时隔十几年，我们再见，先生已经八十高龄，我也年过花甲了。朱光潜告诉我：“从‘半棚’‘解放’出来以后，我又重理旧业，继续中断了多年的西方美学经典著作的翻译，现在已经译完了最难啃的黑格尔三卷本《美学》。”说着，先生露出兴奋、欣慰的神情。

师生畅谈，不知不觉间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朱光潜邀我去吃涮羊肉，我不肯；又要师母到校内食堂买几个菜回家吃，我也不肯。二老都已耄耋之年，怎敢叨扰。我恭敬地鞠躬告别说：“先生保重，我以后再来看望您和师母。”朱未肯想，那是我同朱光潜的最后一次见面。

1983年春节，我照例给朱光潜寄去贺年片，先生回赠了一本他写的《美学拾穗集》，内页写着：“高峰老友指正。光潜，1983年春节。”那年，朱光潜已86岁了。从字迹可以看出，他的手有些颤抖，但他不仅亲笔题赠，而且包书纸上的地址也是他的亲笔，由此推断，包书纸也是他亲手捆扎的。耄耋之人，自己能做的事决不麻烦他人，这就是朱光潜的美德，怎不令人崇敬！

1985年夏，听说朱光潜病倒，我奉函问候，8月得朱师母信，说“先生去夏患脑血管栓，两次住院，未能康复，头脑有时清楚，有时糊涂……先生这晚年工作过于疲累，脑子受到严重损伤”。又说，医生为他会诊的结论是疲劳综合症，“朱光潜太累了”。

是的，朱光潜确实太累了。半个世纪以来，不论是在家里或办公室，每次我去看他时，总是见他在桌前叼着烟斗，不停地读、写，特别是“文革”结束，年逾八旬的老人迸发出一股惊人的拼搏精神，在五六年之内翻译、著述、校阅了400多万字的文稿，其中有黑格尔的《美学》、莱辛的《拉奥孔》、维柯的《新科学》等西方美学经典著作以及《美学拾穗集》《谈美书简》等，基本实现了他晚年的写作计划，丰富了美学研究的宝库。即使这样，他还说，需要做的工作总是做不完的。

1986年3月6日，朱光潜飘然而去，他把永恒之美留在了人间。

（本文作者为《工人日报》原副总编辑）

##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 老舍拜师学拳

周惠斌

1930年，作家老舍来到济南，在齐鲁大学担任教授，业余时间勤奋写作，《济南的冬天》《趵突泉》等描写济南优美风光的散文，都是这一时期的成果，并创作了《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等长篇小说。

由于伏案时间太久，又缺乏身体锻炼，老舍常常感到腰酸背痛、四肢乏力。1933年4月，老舍后背疼痛加剧，多方求医，不见效果，他不由得想到借助武术强身健体，缓解筋骨疼痛。经好友陶子谦介绍，老舍拜时任山东省国术馆济南第四分社社长马永魁为师学习拳术。

马永奎自幼习武，师从山东冠县杨鸿修，得杨氏查拳真传，枪术尤为出类拔萃，有“山东一杆枪”之誉。老舍拜师后，晨练成为每天的必修课，他勤练招式，坚持不懈，效果非常显著，后背疼痛之疾渐渐痊愈，身体也轻快了许多。

##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 陆文夫谈《美食家》

周星

1985年，陆文夫的小说《美食家》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上映，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一时间，邀请陆文夫到各地讲座的信函纷至沓来。

第二年，陆文夫参加《中国纺织报》举办的首届“金梭笔会”。本次笔会参与者是来自全国纺织行业的精英。笔会现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坐等陆文夫开讲。陆文夫进行了简短的开场白后，就绘声绘色地谈了如何创作小说和如何创作人物两方面进行理论讲解。可台下的听众基本没有反应，大家只是呆呆地看着他在台上讲。

这时，陆文夫感觉场面有些尴尬，为难地笑着说道：“大家还要我讲些什么呢？要不这样吧！你们提问，我现场回答。”

话音刚落，会场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大家顿时来了兴致。因为很多人刚看过电影《美食家》，自然有许多问题想提。不一会工夫，陆文夫的桌上就堆满了许多现场提问的纸条。他很快地翻看了纸条上的问题。

有人问：陆老师，《美食家》里面

##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 吴青霞的“彭公案”

刘兴尧

著名女画家吴青霞，别署“篆香阁主”，就是说她的书房名叫“篆香阁”。那么，她家里怎么会有“彭公案”呢？这要从吴青霞的两位闺蜜说起了。

《彭公案》是清末的长篇小说，作者俞樾道人，彭公是指清朝康熙年间的循吏彭鹏。我国著名的几个公案是《包公案》《彭公案》《海公案》《施公案》，也有人说是《狄公案》，讲的是唐代狄仁杰，这些都是古代的好官，是他们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破案安民的事迹汇编，也是古代人民对于清官的向往。因此，《彭公案》在当时的名气很大，可以说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底层百姓，都对彭公案耳熟能详。

吴青霞在上海的时候，跟周炼霞和陆小曼交好，由于三个人都长得非常漂亮，又是闺蜜，整天形影不离，因此，曾有人把她们三人称为“海上画坛三美女”，可见她们三个既是才女，又是

##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 “二妹子”陶玉玲

王荣 王抒滢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这是1957年上映的电影《柳堡的故事》的插曲。它来源于抗日战争时期一个真实又凄美的故事，军旅作家石言以此为原型著成一部小说，并为这个故事写上了圆满的结局。剧本完成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立即投入拍摄，并指定由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莘来执导这部影片。

王莘开始寻找饰演主人公“二妹子”的演员，但很久都没有合适的人选。正当她一筹莫展的时候，该片的编剧黄宗江给推荐了一个人，说当初在南京前线话剧团的时候，看见过一位女演员，特别喜欢笑，而且“一笑起来像蜜一样甜”。王莘心想，这不就是二妹子吗？黄宗江说这位女演员名叫陶玉玲。然而，当她见到陶玉玲时，由于演出疲劳过度，陶玉玲眼睛长了麦粒肿，脸都肿得变形。王莘却感到陶玉玲尽管“不美”，但气质不错，她把陶玉玲与其他人反复比较，最后还是决定让陶玉玲来饰演“二妹子”。

陶玉玲在《柳堡的故事》中的台词

从此，老舍每天早上坚持打拳，寒暑无间，打拳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还习练了少林拳、太极拳、五行棍、太极棍、粘手，掌握了多项武术技能，包括拳术、剑术、棍术和内功等。1933年底，老舍在《一九三四年计划》中写道：“提到身体，我在四月里忽患背痛，痛得翻不了身……于是想起了练拳。原先我就会不少刀枪剑戟——自然只是摆样子，并不能去厮杀一阵……因为打拳，所以起得很早；起得早，就要睡得早；这半年来，精神确是不坏，现在已能一口气练下四五趟拳来。”

为感谢师恩，1934年，老舍准备了一把精美折扇，亲笔书写了自己随师习武的经过，赠送给马永魁。并请自己的好友、山东籍著名山水画家关友声在折扇背面绘写泼墨山水，表达了高山仰止之情。

的菜，您是否都品尝过？

陆文夫大声读完这个问题后，“噗嗤”一声笑了起来。他回答道：鲁迅先生研究封建社会史，就发现了两个字：吃人；我研究人类生活史以来，发现了也是两个字：吃饭。所以，我就写了《美食家》。现在许多地方害怕我去，怕我这个吃客挑剔。其实，我的美食要领是：不懂得吃的人是“吃饭店”；懂得吃的人是“吃厨师”；还有“吃空气”，就是吃饭店的气派、气势、气氛，以及豪华的装修、精致的餐具和小姐们垂手而立的服务。如果你以为《美食家》里面有许多菜的话，那你们就上当了。那里面有的，都是我虚构的，自然我也不可能品尝过。包括最后一道菜也是虚构的，不过我听说已经有饭店尝试烹任出来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和品尝一下。

陆文夫说完，台下笑声一片。

陆文夫还回答了其他的一些问题，尤其就“小说创作中如何处理虚构与真实的关系”和“如何分辨流派”两个问题，给大家作了深刻的解读。整场笔会就在这样一问一答中进行着，直至结束。

美女。其中陆小曼是常州人，和吴青霞是老乡，她们二人还有亲戚关系。周炼霞是湖南人，当时她们三个各有特色，周炼霞优雅、机敏，吴青霞娟秀、清丽，陆小曼蕴藉、风雅，一时在上海名闻遐迩。

一次，周炼霞到吴青霞家中茶叙，看到吴青霞画室“篆香阁”中有一巨案，长有一丈，宽有三尺多，是一整块杏木制成，周炼霞一看，案子非常有气势，就问吴青霞，这块案子从哪买来的，吴青霞就说这是彭玉麟当年为画梅花而特制的。彭玉麟是清末四大名臣之一，他和梅花的爱情故事，非常凄婉，他一生画了十万梅花，非常钟爱梅花，为画梅花，还特意做了一个案子，不知怎么落到了吴青霞手里。周炼霞一听这是彭玉麟画梅花的案子，脱口而出：“原来是‘彭公案’啊！”逗得吴青霞哈哈大笑，也显示了周炼霞的机敏无双，从此，吴青霞有个“彭公案”的典故，在上海画坛传为美谈。

很少，但她凭着悟性灵气把少女的爱情展现到了极致。导演王莘只要一点拨，她就立马能够明白。而王莘点拨最多的就是那句“二妹子，给我们加点糖”，陶玉玲转头自然流露出的甜美笑容，将少女的害羞情怀展露得淋漓尽致又恰到好处。影片放映后，“二妹子”纯洁甜美的微笑成了那个时代青春偶像的象征。

1958年，《柳堡的故事》成功后，陶玉玲作为青年演员到北京出席全国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接见。翌年，陶玉玲应邀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的欢庆宴会，周恩来接见电影界的同志，对陶玉玲说：“你是在《柳堡的故事》里演二妹子的吧，演得很甜啊！”又接着说道：“演得不错嘛，可是你还很年轻，不要骄傲，好好努力。”

1963年，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进京演出，剧团人员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将话剧改编成电影，1964年在全国放映。陶玉玲饰演坚毅柔情的军嫂春妮，淳朴真挚，她用画外音读出的写给丈夫陈喜的信更是催人泪下，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齐邦媛在武大

## 齐邦媛的一封信

按说，《巨流河》的众多热心读者中理应有我的母亲卢坤缜，因为齐邦媛书中描述的武汉大学在乐山的生活与卢坤缜密切相关，何况她们还曾同窗三载。齐邦媛准备写作之前，曾经鸿雁传书，特意向卢坤缜询问有关朱光潜的资料。可惜，2008年的一场大病击垮了我85岁的老母亲，《巨流河》在大陆出版时，她已经无意识地在病床上昏睡3年了……

那是2000年元旦后，我母亲突然接到一封台湾来信，写信人竟是失去联系多年的同学齐邦媛。信中写道：“……这是一封超越半个世纪的令你意外的信，从四川乐山到台湾，我们由青春走到老年，竟在‘珞珈通讯’上看到你的那封信，读到你在北大随朱光潜老师及教学的经历……你大概是我所能联系到最知道光潜师的人了，盼望你能给我一些指引，如何可以找到有关他的文字资料……间隔的五十多年中，我处处感念在武大受教之情，想写一生心路历程……”

齐邦媛是武汉大学外文系1943级学生，与卢坤缜同系，低一年级。当时武大因抗战西迁四川乐山，在校女生总数不过二三百人，都住在号称“白官”的同一宿舍（详见《巨流河》书中描述），彼此结下姐妹情谊。1946年，时任武大教务长兼外文系教授的朱光潜辞去武大教职，应复员北归的北京大学之聘，出任西语系主任，并请刚刚毕业的卢坤缜作为助教随同北上，从此与齐邦媛告别。1947年，齐邦媛毕业后到台湾大学任教，两年后海峡两岸隔绝，如同许多同学、亲友一样，她们失去了联系。（在卢坤缜的通讯录中，却一直记着齐邦媛的地址：北京东城大羊宜宾胡同三号，电话5·1246）

“珞珈通讯”是武汉大学在校校友于20世纪90年代自办的同学交流刊物，刊名取自武汉大学所在的武汉珞珈山，撰稿人大部分是古稀之年的校友。已在北京外交学院教课离休的卢坤缜辗转读到刊物，得知了许多同学的消息，感慨之余也给主编者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毕业后经历，不意被齐邦媛看到，由此恢复了联系，卢坤缜尽己所能为齐邦媛提供了朱光潜的资料。

齐邦媛信中所说的“想写一生心路历程”，就是后来出版的《巨流河》，其中用了很大篇幅写武大生活，特别是朱光潜亲自邀请她从哲学系转到自己门下读外文系，以及她接受朱光潜教诲的种种情景。此时距她离开武大已经60多年，而朱光潜作为影响她一生的四个人之一（其他三人分别是其父齐世英、初恋张鹏飞和大学者钱穆。齐邦媛的职业选择和学术成就也得益于朱光潜），给她留下了终生不忘的记忆，由此可见朱光潜的人格魅力。

## 朱光潜爱生如子

其实，能够为齐邦媛提供更多朱光潜资料的应该我的父亲张高峰，